

● 学海钩沉

两代大师的风范

——刘永济、程千帆两先生的学术与人格

吴志达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志达(1932-), 男, 浙江东阳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和中国小说史研究。

[摘要] 刘永济、程千帆两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其特点是由博返约、厚积薄发, 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相结合, “知”与“能”相统一; 他们人格高尚, 忠诚教育事业, 尊师重教, 奖掖后进。

[关键词] 国学大师; 古代文学; 博大精深; 考据与理论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6-0737-07

美好的事, 总是难以忘怀的。那是1956年,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取了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离京来汉前夕, 我和郝延霖去向著名文学史家谭丕模先生辞行, 话别中, 谭老师提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五老’, 国学大师刘永济先生是‘五老’之首。”“你们的导师程千帆, 成名早, 解放前就发表过颇有分量的著作, 现在才四十几岁; 他的夫人沈祖棻是位词人。你们能到那个名师荟萃的地方作研究生, 很好。”

到武大不久, 系领导为欢迎沈祖棻先生从苏州师院调来武大, 祝贺程先生阖家团聚, 在行政大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全系教师及研究生联欢会, 有机会目睹中文系的教师阵容。“五老”除了徐天闵先生因病未能出席外, 刘永济(弘度)、刘博平(颢)、席鲁昶、黄耀先(焯)诸老, 都得睹风采。程先生神采焕发, 即席吟诵了沈先生作的词[水龙吟]“几年尘篋重开”, 真是声情并茂。与程、沈两先生年辈相近者, 有袁昌英、毕奂午、刘绶松、周大璞、李健章、周光午、胡国瑞、张月超、潘耀麟、傅铭第、李格非等中年教师。还有一大批风华正茂, 有的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 真可谓人才济济。全场气氛和谐欢快、温馨融洽, 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氛围和人情味。似乎有不成文的规矩: 座次有序, 讲话是由弘老、博老两位泰斗先讲, 散会是让“五老”先走, 然后按中、青之序鱼贯而出, 彬彬有礼。回首当年盛事, 恍然如在眼前。现在我只想略述以刘弘老和千帆师为代表的两代国学大师的风范, 以发扬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为人品格。

一、广博精专、厚积薄发的治学之道

国学大师之称, 当然首先体现在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学养、识见上, 达到其生活的时代所能达到的制高点, 其学说为海内外同行专家所首肯, 具有权威性、创造性。千帆师就曾称道弘老“治学之广, 读书之多, 是惊人的。他在群经、诸子、小学及古史方面, 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 在沿革地理、名物制度方面, 修养都很深厚。所以研治古籍, 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1] (第15卷69页)刘先生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仕宦之家, 从小受家学熏陶, 博览群书, 在国学方面打下厚实的根基, 又受过近代科学教育, 曾在北

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这对培养他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意识大有好处。他不仅学兼文史,而且善于融汇中西;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在诗词创作方面自成一家。

刘先生的学术著作,在生前出版的,数量不算很多,但就质量而言,都是一流的。他早年的著作《文学论》,可以说是我国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概论》专书,“贯通中西、要言不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学术界常以“十年磨一剑”来形容治学用功之精,这种精品意识,在刘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用功最深的是《〈文心雕龙〉校释》,此书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就完成了。同类著作,此前为学术界所推崇的,有黄侃(季刚)著的《〈文心雕龙〉札记》。据先师千帆先生记述,刘先生曾在闲谈时对他讲:“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正好道出了黄先生精于小学,而刘先生自己长于持论的特色。该书解放前曾由正中书局出版,但他不断地加以修订,精益求精,直到 1962 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刘先生治学的风格在于求真、精要。《校释》不附《文心雕龙》原文,故省略大量篇幅,其书体例,除简要的《前言》可谓对《文心雕龙》的总论,指出优缺点,并说明他作校释的用意和经过;“校”即校正《文心》原文的讹误,可见其目录、校勘、版本之功;最精彩的是“释义”,对原著 50 篇逐篇予以分析、论述,以极简练的文字,剖析其内涵,并联系近人类术语,辨讹析误,得其精髓,从中体现出对儒、道、释诸家思想与文学关系的理解,涉及经、史、子、集诸部书,博大精深,触类旁通,既“力求不背原书之意”,又多有创见,发前人之所未发。丰富精辟的内容,却能要言不烦,全书不到 13 万字,大匠运斤之功,由此可见一斑。诚如千帆师所云:刘先生“毕生致力于屈原研究”,其代表作《屈赋通笺》初稿,1932 年就完成了,经反复修订,于 1953 年写定,为对有关全书总义,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又另撰《笺屈余义》19 篇。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两种著作合为一部,于 1961 年出版。从完成初稿到正式出版,经历了近 30 年的磨砺,其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可叹为观止。

刘先生青年时代,曾师事近代词学名家况周颐、朱祖谋,深受两位词坛巨匠的赏识。其实在他少年时,就“得古今词集于姑丈松琴龙先生家,久之,亦稍习为之”^①,有此良好基础,故经老辈名家点拨,遂走上研究词学的道路,在词的理论 and 创作上,都取得辉煌的成就。他治词也是由博返约,早年讲词选课,编有《诵帚庵词选》四卷,选篇较多。60 岁后,撷取唐宋词之英华,编撰《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卷首有一篇“总论”性的文章,篇幅不长,却将唐五代两宋词的主要流派,溯源穷流,作了系统、精当的论述。对每篇所作的注释,亦极其精要,富有特色。《微睇室说词》,原是刘先生于 1961 年为青年教师讲授婉约派词而撰写的讲义,以吴文英为中心,上连周邦彦、姜夔、史达祖,下挂王沂孙、周密、张炎,婉约派的源流毕具。我有幸听课,先生坐在躺椅上讲,语言平和简约,分析缜密透彻,结合具体作家作品,讲授作词和鉴赏词的方法。我们为了笔记完整无误,向他借阅讲稿,他毫无保留地把用活页纸写的讲稿借给我们,端正而有灵秀之气的蝇头小楷,写得非常清爽,讲稿实际上就是高档次的论著,是一部佳作。

自宋代以来,关于词学理论,往往以词话的形式出现,种类繁多,众说纷纭,不免金子泥沙俱存。刘先生有鉴于此,编撰《词论》一书,对以往词话,作了严谨的去粗存精,上卷为《通论》,分列名谊、缘起、宫调、声韵、风会五个专题;下卷《作法》,分总术、取经、赋情、体物、结构、声采、余论七个专题。列引诸家对某一专题之论述,刘先生则于其前后,或加叙论、阐述,或加按语论其要义,辨误正讹,阐明己见,新意迭出,多所发明,而文字极其简约。刘先生曾对千帆师说:“这事实上是一部词话选,前人的精论要语,都在其中。”而不张扬自己的创见精意,如何超越前人,其实精彩处亦正在其新加之论释、按语。例如《通论》末篇《风会》,即通常所指流派,先生则在其篇首叙论云:

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派别近私,风会则公也。言派别,则主于一二人,易生门户之争;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于有关焉。盖风会之成,常因缘此三事,故其变也,亦非一二人偶尔所能为。自来论者未能通明,故多偏主,或依时序为分别,或以地域为区画,或据作家为权衡。……

“风会”之论,似比“流派”之说,更胜一筹,也更切合实际,内涵更严谨、完整,尽管难以取代习惯已久的旧说,毕竟是具有创新意义、有胆识之举。又如《作法》首篇《总术》,对词学家习用的诸如清空、襟抱、胸次、

风度、气象、气格、词境、意境、境界、寄托等术语，关系到作词或品赏词的方法和尺度，但词学家之论，时或失于抽象玄虚，不易准确领会把握。刘先生对每一术语，在列举诸家之说后，加上按语，将众说融会贯通，以晓畅精警、言简意赅之语，阐明要义，断以己见，有继承，又有创新，多有精辟独到之处，非一般缺乏理论素养和作词经验者所能望其项背。

刘先生的著作还有多种，例如《十四朝文学要略》，就是一部“在结构和见解上都有特点的文学史”，他对当时同类著作“杂撮陈篇，补苴琐屑”，或“稗贩异国之作，绝无心得之言”颇为不满，故其书独辟蹊径，着意创新，重在立纲论史，以持论为经，行文练要而多卓见；以注释方式征引前修之说或加按语予以阐发幽微为纬，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对自先秦至隋各体文学之流变、升降盛衰之势、代表作家之同异得失，知人论世，独具匠心，切中肯綮。虽时逾70余年，犹有别开生面之感。《唐乐府史纲要》，则是“迄今为止，我国研究唐代乐府历史的唯一专著”^[1]（第64页）。《唐人绝句精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及《元人散曲选》，在其序论和选篇、注释中，都有其独创性的见解。如对唐人绝句的源流正变之论，宋代歌舞剧曲在结构上有纵排横列之分，元人散曲有阴刚阳柔不同的审美趋向，都颇具卓见。

在刘先生诸多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在同时代学人类似著作中居领先水平的，是屈赋、《文心雕龙》及唐宋词三大领域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体会到什么是精品意识，发人深思，颇受启迪。

先师千帆先生，年龄比刘先生整整少26岁，在学术界属于新一代大师级的学人。在治学思想和学术风格上，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两代学术界的明星，在1956年评定级别时，刘先生是由北京大学游国恩等几位名教授建议评为一级的；程先生才42岁，就评为三级教授。他们两人都被《文学研究》（即后来的《文学评论》）聘为编委，这正反映了武汉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当时的学术地位。与刘先生一样，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同辈中的佼佼者，和家学渊源、师承关系以及自身的勤奋，密切相关。他自己在《桑榆忆往》中说：“诗是我的家学，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其父穆庵先生专攻宋诗，尤精于陈后山。这对他后来擅长唐宋诗研究，可谓影响深远。他在堂伯父君硕先生办的“有恒斋”私塾学习的几年间，奠定了国学的坚实基础，像《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等典籍，他都熟读了，这也就是所谓“童子功”，终生受用。

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更富于现代意识，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创造力极强的国学大师，与他到南京接受从初三到大学毕业，整整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至关重要。当时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名师云集，教授在两座大学兼课，学生也可以在两校互相听课。他师从黄季刚学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学目录学，从吴梅学词曲，从汪辟疆学唐人小说、目录学和诗学，还向汪旭初请教词、向历史系的陈登原学《中国文化史》和《国史旧闻》。转益多师，汲取众长，文史兼修，学贯中西，终成巨匠。

他和刘弘老一样，都是学识广博的通才，但他们又都是由博返约、学有专精的学者。千帆师著作等身，全集洋洋洒洒15卷，蔚为大观。几部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文论十笺》、《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今选》、《读宋诗随笔》、《杜诗镜铨批钞》以及《古诗考索》中的大多数文章，是在武汉大学时写的；有些著作，如《校雠广义》、《两宋文学史》、《程氏汉语文学通史》等，虽然是晚年去南京大学后与门生或友人合作完成的，但是大都是在武汉大学开课的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被开拓的诗世界》，则是晚年与莫砺锋、张宏生诸高足合作的。涉及的面很广，博大精深，但从各种著作中可以看出，达到学术制高点的精心之作，体现在广义校雠学、古代文论、唐宋文学三大领域，兼及史学。

谈到千帆师由博返约的治学之道，不禁使我回想起将近半个世纪前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和郝延霖的一席话。他说：学术研究当然要出成果，但是不能急功近利，要把基础打得宽厚一些，要像金字塔那样，切不可像根电线杆。比如你们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也必须熟悉先秦两汉的典籍，不然，以后就会吃亏。汉魏六朝小说，特别是唐人传奇，对后来的戏曲、小说影响深远，不溯源难以穷流，广博才能专精。他还强调，视野要宽阔，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要懂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弘度先生特为你们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设《文心雕龙》课，认真听，必受教益；马列和西方的文艺理论也要学，但是不能生搬硬套，中

国有中国的理论批评特色。他还要我们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文学根据现实生活的折光,把某个历史时代人的行为和思想如实地反映出来,即把文学放到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听师一席话,我们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二、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知”与“能”相统一的学术思想

文献考据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学术思想,是刘、程两代大师学术研究的共同特色。这种治学观念,刘先生主要体现在《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论略》、《屈赋通笺》、《〈文心雕龙〉校释》、唐宋词研究等具体的学术成果中,其特色就是既长于考据,又长于持论,但不作声张;千帆师则反复多次、明确地提出这种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沈祖棻先生在论及他们两人合作的《古典诗歌论丛》时,他在一次《关于治学方法》的谈话中,以及在给我的信函里,都曾强调考据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重要意义。这种自觉的治学方法,使他的学术成果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创新精神。他的论著中既具有翔实的文献资料和缜密的考据之功,又有着鲜活的理论深度,善于从不同的侧面、新的角度找准新的切入点。他从不作缺乏过硬文献资料的空疏之论,也不作缺乏理论深度的烦琐考证,没有套话、空话,力求陈言之务去。他既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强调科研的价值必须在前人已有的成绩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他还认为不应当把马列主义理论与研究对象作为互相引证其正确性的手段,“治学、做学问,就是要创新”,“要真正做到思想解放……也要靠我们自我摆脱经学的重压,才有可能使学术前进。”“什么叫辩证呢,就是一分为二。什么叫唯物呢,就是实事求是。”^[2](第 319 页)这也就是理论研究不能教条化,而要与时俱进的意思。他尝试着用新的思想方法探索复杂的学术问题,并主张从具体作品、研究对象中抽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3](第 3 页)。这在《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特别是他晚年的几篇代表作,例如《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及其[附录]《从小说本身抽象出理论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韩愈以文为诗说》等杰构,正是其治学思想、创新意识具体实践的成果。

刘先生和千帆师都主张“知”与“能”的统一,意即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者,也应能从事创作实践。自身有创作实践的经验,对品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上的某些现象,就不至于隔靴搔痒,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外行话。因此,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最好自己也能写作古体诗、词和文言文。刘先生的白话文,其实也是写得很漂亮的,特别是专为一般读者写的、带有普及性的读物,例如解放初期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一篇鉴赏元人散曲《汉高祖还乡》的文章,或者几种选注本的《前言》,就是流畅简练的白话文。但是绝大多数学术专著,都是用文言写的,简约而不晦涩,内涵丰富,遒劲中显其豁达明畅,颇具先唐散文的风格韵味。刘先生擅长诗、词创作,尤其是词,《诵帚庵词》不失为一代词坛名家。如前所述,他的《词论》,融汇诸家词学之长,出以己见,独树一帜。所以他的词作风格,兼有婉约、豪放特色。首次以所作[浣溪沙]“几日东风上柳枝”就正于晚清词坛宗匠况周颐,就受到赞赏;另一首即席分咏之作,更得到当时词坛领袖朱祖谋的重视,认为“此能用方笔者”,方笔者,刚正遒劲之谓也,于婉约阴柔之美中,寓有豪放阳刚之美的气质,这也正是刘词的特色。在“历世既久,更事既多,人间忧患,纷纭交午,有不得不受,受之而郁结于中,有不得不吐者,辄于词发之。”此种寓豪放于婉约之中,具有刚柔兼济之美的风格特征,更为突出。纵览其词集,自 1931 年在沈阳东北大学始,至 1960 年参加武汉市政协会议止,分《语寒》、《惊燕》、《知秋》、《翠尾》四集,抒发从“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流寓北京,到武昌武汉大学任教,西迁乐山,直到新中国诞生十周年,感情变化,心路历程,一个具有正义感和爱国的知识分子,抗日救亡、忧国忧民之情,讽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窃禄者蠹茸淫昏,绝无准备,国势危于累卵,中情激荡”的愤激情怀,历历在目。其[满江红]曾谱曲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军歌。对湘战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为衡阳守军奋战 47 昼夜、全军伤亡而无援军深感悲愤。也有倾诉亲情、友情的。前三集写在旧时代,悲多欢少;最后一集,为解放后之作,歌颂党和社会主义成为主旋律。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典礼,国庆十周年,学习新理论,

乃至友邦前苏联卫星上天、宇宙飞船首航太空，参加市政协会议，都曾写下华章，热情洋溢，放声高歌，欢快之情有如孔雀开屏，故名其集为《翠尾》。称之为史词，恐非溢美。“文革”初始，有人受命审查先生词集，竟被视为“毒草”。在那特殊的年代，出现此类怪现象，固无须深责。但宋人张芸叟诗句：“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的慨叹，亦当引以为诫。

千帆师的论著，除《史通笺记》、《文论十笺》等著作采用文言外，毕竟他主要的学术生涯是在新中国渡过的，故其多数著作，都是用逻辑严密、思辨力强而流利晓畅的白话写的，时或有幽默感，笔锋犀利而内涵深刻。由于他国学素养丰厚，娴熟历代典籍及文体，往往根据所论叙对象，凡更适宜用文言来表述的，如《闲堂文存》中多种序跋题记，就是非常精妙的文言文，其用典的贴切、掌故之丰富、涉及领域之深广，文笔的精警灵动，不愧为继刘先生之后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他早年写过不少新诗，保存下来的还有50余首。从1937年至1996年，存旧体诗238首，“自道其哀乐”，抒悲喜爱憎之情，或因亲人、友人之离合悲欢，或缘国事、世情之风云变幻，均见于诗中。他那赤诚、真挚、坦荡、激越的心，毫无掩饰地呈现在诗句之间，见其诗，可感触到其心灵跳动的节奏。特别是《八里湖作》、《破角诗》以及《读庄》、《戏为九绝句》、《咏史》、《独携》等组诗，或感慨历尽坎坷，虚度美好年华，或在咏物中蕴含着人生命运的哲理，或对逢迎取媚、率尔为文者的冷嘲热讽，或对“四人帮”胡作非为、倒行逆施终于覆灭的嬉笑怒骂。其风格或沉郁凝重，或叹息悲歌，笔底波澜，抒情纪事以存其真，无愧为史诗。他偶尔也作词，但多未留稿，仅存十余首。最深挚感人的是两首悲悼沈祖棻先生逝世一周年的[鹧鸪天]，“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春风重到衡门下，人自单栖月自圆”。“难偿憔悴梅边泪，永抱遗编泣断肠”。情深意切，催人泪下。

三、忠诚祖国的教育事业，尊师重教，奖掖后进

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是自孔子以来，我国教育工作者的优良传统，这种精神，在刘、程两代教师的实际工作中，有着突出的体现。刘先生于1917年，应老师长沙明德中学校长胡元琰之约，任教该校，因胡校长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被军阀张敬尧追捕，胡校长仓皇逃离，学校濒临瘫痪。刘先生慷慨解囊，将多年积蓄准备出国留学的3000银元，全数作为学校经费。他以身作则，仍留校教授国文，和其他教职员一样，每月领八元生活费，终于使学校支撑下去。后来，刘先生宁可放弃出国留学的宿愿，也不向他的老师胡校长索回3000元应急垫付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先生是尊师重教的楷模。

他在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文学院有众多著名教授，尽管在学术思想上有较开明的胡适派学者、有较保守的学衡派或较持重的章黄学派传人，刘先生与不同学派的教授都能平等相处、和衷共济。他还曾数次礼聘困居桂林的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亦极愿应邀，只因为当时健康状况不佳，且有家属拖累，不宜跋涉万水千山，未能赴四川乐山武大任教。刘先生非常爱惜人才，他看了程千帆先生发表在西南联大由余冠英主编的《国文月刊》上的几篇文章，并在交往中深知这位才28岁的青年，富于学养才情，就请当时在乐山艺专专科学校教国文的程先生，到武大讲授《文学发凡》（即稍后出版的《文论十笺》）。刘先生担心他初到大学授课能否胜任，就在程先生的课堂隔壁，旁听了一个星期11节课，才放了心，这也是重视教育、奖掖才俊的佳话。程先生也没有辜负老一辈的期望，以其勤奋和才能，屡创佳绩，从1940年到1947年七年间，由助教晋升到教授，周鲠生校长遴选他为中文系系主任，与金克木、吴于廑、唐长孺、周煦良，同为文学院少壮派五大俊杰之一。千里马也需要有伯乐才能展现绝尘之才，信不谬也。

刘先生直到耄耋之年，不仅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上课，批改词作和读书笔记，传授治学方法，还为本科生讲授唐五代两宋词课。诚如关门弟子马昌松、刘庆云所说：“为了培养接班人，先生真是呕心沥血，生死以之。”

同样，千帆师对党的教育事业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解放初，像《文艺学》这样的新课，以及为历史系开设一年制的《中国文学史》课，都没有人愿意承担。他是中文系系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性很强

的《文艺学》,他边学边教,接受新思想、新理论的能力非常强,加上他固有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扎实功底,中西融会贯通,把《文艺学》这门新课讲得深受学生欢迎。为历史系学生开的《中国文学通史》,效果也非常好,晚年出版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就是在原讲义基础上修订完成的,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其他几部《中国文学史》在着重点和写法上大不一样,绝无雷同。他视教学工作为教师的头等大事,培养人才,让学生出成果,比自己著书立说更为重要。尽管是讲过多次的课,每次上课前都作精心准备,印发的讲义不断修订更新,口才音色又好,富有魅力,学生听他的课都觉得是一种艺术享受。对培养研究生,倾注更多的心血。20世纪50年代,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只程先生一人招收研究生,我们师兄弟共4人,吴代芳、苏德云攻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我和郝延霖则攻读宋元明清文学。我们既感到千帆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如沐春风,又深感严师之严。他很重视基本功训练,教我们如何使用工具书、查阅古籍文献,从做资料卡片、写读书札记到写作论文,都提出严格要求,做到每项工作的规范化。我们除了听他讲授宋元文学史,刘先生讲《文心雕龙》,沈祖棻先生讲宋词以外,还定期与他面谈,我们提出在学习中发现的问题,他针对我们所提的问题谈他的看法,而主要谈理解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治学门径,鼓励我们能提出不同意见。他不采取满堂灌的方式,重在授予我们解决问题的钥匙。他考核我们的主要方式,是写论文,他认为从论文中,既可看出掌握专业知识的水平,也反映出理论学习情况;既可看出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体现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能力;通过点的深入,带动面的提高,有利于综合素质的锻炼。所以,他对写论文这一环节抓得很紧。作为学习宋代文学的课程论文,我选的题目是《王安石诗初探》,郝延霖的选题是《论苏轼诗》。我们的选题报告得到程先生的许可,并当即把他的私人藏书李壁《王荆公诗集笺注》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借给我;把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和《苏诗总案》借给郝延霖,这些都是线装善本书。还用大牛皮纸资料袋给我们装了一大袋芝麻花生糖,临别时饶有风趣地说:“各有所携,满载而归”。爽朗的笑声,仿佛犹在耳际。

在听课和交谈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千帆师是一位才气横溢、思维敏捷、有着非凡记忆力的学者。他每周为本科生讲授6课时《宋元文学史》,总是在两三周前就把铅印讲义印发给学生,平均每周末大约要写18000字左右可以付印的讲义,后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宋文学史》,就是在当年讲义基础上修订的。在讲课前印发讲义,对学生来说,当然方便多了,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而对教师则是一种考验。如照本宣科,效果决不会好。程师讲课,既不离开讲义,又不是宣读讲义,抓住难点、疑点,讲得丰富多彩,触处生春,语言的逻辑性具有一种雄辩力量,又生动活泼,且具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他的记忆力之强,令人惊奇。他不只是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各种文献资料,能一字不差地冲口而出,更了不起的是在我们向他汇报论文大纲时,他根据我们提及某书的篇名或年谱、诗话中的某条考据材料,就能把原文背出来,并且指出应补充某条资料或改正某条资料的讹误,确非常人所能及。我们请他批阅的论文稿或读书札记,往往改动一字,全段皆活。更使我感动的是,他的教学、科研工作那样忙,还把经他批改的论文稿,亲自送到我们宿舍里来,并鼓励我把文稿寄出去,这就是刊载于1957年12月号《文史哲》上的那篇习作。他那奖掖后进惟恐不及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程先生于1978年8月,到南京大学工作,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他一直关心我的学业,也关心中文系的学科建设。我为研究生开设《唐人传奇探说》课,他就把陈寅恪、戴望舒、孙望等前辈相关的论著寄给我参考。1980年初,我把这门课的油印讲义寄给他,本意是请他提意见。出乎意料之外,他一看完这份讲义,就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不到一年,书就出版了。我心想在研究唐人传奇的基础上,进一步溯源穷流,写一部《中国文言小说史》,但担心战线太长,恐难收效。他知道我的顾虑,就托张三夕师弟带给我一幅亲笔隶书长条,题着荀卿名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我把他作为座右铭,催我奋进。该课题承学校支持,向国家申报,批准作为“七五”社科研究规划重点项目,花了近十年功夫,终于完成《中国文言小说史》之著,千帆师以80高龄,既审阅全部书稿,又为书作序,关爱老学生之情,真是一言难尽。我才把齐鲁书社寄来的校样稿校完,千帆师来信说,要给我“压一副重担”,即要我承担《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主编的工作,我既是遵老师之嘱,也出于为我校在古

代文学领域争一席之地的考虑，毅然接受此项国家级的大型文化工程。承担此项任务，其精神压力比自撰一部专著要重得多，有诸多难以想象的棘手问题。程先生巧妙地将宋人方子通的一首七绝，写成条幅赠给我：“溪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借此诗启发我克服困难的藝術。程先生组织、协调、领导学术群体的才能，确实不同凡响，具有大师的超凡气度。现在可以告慰老师的是：付出我们四代人（帆师、我及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十年辛劳的此项浩大工程，已基本告竣。火尽薪传，当可无憾。

还值得提出的是，程先生到南京大学后，不仅为国家培养出第一个文学博士、一批拔尖人才，建成全国一流的学科基地，还为他的老师整理遗著或推荐出版。他亲手整理的《黄侃日记》，虽然早已发排，因故未能及时出版，故到2000年千帆师弥留之际，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我对不起老师”，书已于前年出版，帆师于九泉有知，定会感到欣慰。

无论是刘先生还是程先生，这两代大师，对他们的老师来说，是最好的学生；而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又是最值得尊敬的好老师。正是：

江河流日夜 薪火传千秋

注释：

① 见刘永济《诵帚庵词·自序》，1964年武汉大学印刷厂排印本。

[参 考 文 献]

- [1] 程千帆. 程千帆全集[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2] 程千帆. 闲堂文薮[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4.
- [3] 程千帆. 程千帆诗论选集[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何良昊)

LIU Yong-ji & CHENG Qian-fan: Two Great Masters

WU Zhi-d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U Zhi-da (1932-),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

Abstract: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studies of Professor LIU Yong-ji and CHENG Qian-fan as great master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ies in the following way. They would never make an attempt at any thesis writing until a thorough and profound reading and thinking have been accomplished. Meanwhile, their examin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 had always been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criticism, and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what one grasp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one's literary writing practice is also highly stressed on the dedication to their teaching careers, the respect for their teachers as well as the recommendation and promotion they made towards their followers are an exhibition of their noble personalities.

Key words: master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rich and profound in knowledge and studies